

创新用地模式 促城镇化建设

■皮 凌

核心观点:
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坚决摒弃保障发展与保护资源相悖的传统观念,切实克服讲发展就要牺牲环境资源、谈保护就要减缓甚至停止发展的思维定势。

省委组织部安排我参加了全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训班,让我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涵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 and 理解。我认为国土资源部门在发挥职能作用,主动作为,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大作为。

正确处理保护资源与保障发展的关系,积极探索化解“两难”的有效途径。对于咸宁市,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占用了不少土地,其中包括一定耕地。但我们认真贯彻基本国策,通过各级政府层层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状,通过开展土地综合整治

和占补平衡,确保了全市285万亩耕地保有量不减,235万亩基本农田不碰。

面对当前“两保”的责任和“两难”的挑战,我们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决摒弃保障发展与保护资源相悖的传统观念,切实克服讲发展就要牺牲环境资源、谈保护就要减缓甚至停止发展的思维定势,真正按照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方针,科学谋划,大胆创新,积极寻求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新办法、新机制,走出一条“双保”双赢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科学编制土地利用规划计划,不断优化城镇化布局空间。面对咸宁早日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我们如何把握两个纲领性的要点,即绿色GDP和民生GDP,做好服务性文章,既要加强规划计划管控,强化精细化管理,协调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三规”同步实施,做到应保尽保;又要抓好宏观调控,加快推进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低丘缓坡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省级试点,加快推进“六城三区”建设,鼓励发展小城镇和二三产业融合,优化国土资源总量调控机制,综合运用规划、计划、审批、供应等手段,用足用好活国土资源政策,做到既不盲目铺大饼,又保障城镇化发展用地的合理需求。

大力推行节约集约用地,促进城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我们要牢固树立“小土地、大发展”的理念,坚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坚持严格执法监管,坚持政策引导与市场配置相结合,打好GDP地耗下降攻坚战,深入开展单位GDP地耗评估考核和土地利用绩效考核;打好土地利用综合监管攻坚战,继续采取收回、置换、处罚等强力措施,切实把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作为破解土地要素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来抓,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不断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扎实开展土地综合整治,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互为依托、相互促进。城镇化建设必须有农业的支撑、粮食的保障。推进现代农业化,也必须依靠改革这个最大的红利来实现。我们要抢抓机遇,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在竭力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充分发挥耕地的生态功能、体现耕地的生态价值,统筹生态文明建设、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为加快推进省级战略咸宁实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市政府市长助理、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权力是一种担当更是一种责任

■来华雄

核心观点:
权力是一种担当,更是一种责任,是有所作为的内在要求。作为管理和服务职能的承担者,既要履责、尽责,必要的时候还要进行追责。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执政骨干队伍”。

笔者以为,权力是一种担当,更是一种责任,是有所作为的内在要求。作为管理和服务职能的承担者,既要履责、尽责,必要的时候还要进行追责。

强化履责“意识”。就是要明确责任,担当责任,落实责任。一是要明确责任。明确责任的主体,明确担负的任务,每天用责任来约束自己、反思自己、

检查自己。二是要担当责任。鸿忠书记讲过一句话:“能力担当的欠缺是最大的贪腐。”按照这一要求,我们要敢于担责,迎难而上,要有一种“舍我其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并经常自我警醒。三是要落实责任。要科学规划,合理安排好每一个阶段的工作,我们不可能都像伟人那样轰轰烈烈,但我们可以像凡人一样生活,像凡人一样思考,善于积小胜为大胜。聚石成山,积木成舟,把一件件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成功。

强化“尽责”意识。思路决定出路,如何尽责?一是要有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有无悔的事业追求,做到一起步,就跑步。要以干就干一流的目标要求,干好每一项工作,搞好每一次服务,抓好每一次落实;假如每个月完成工作任务的90%,七个月以后,就只能完成总

任务的56%,这是个惊人的递减过程。二是要有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开拓创新是一种工作水平,也是一种时代要求,是个人胆识和锐气的集中表现。要从困境中找到出路,从困难中找出办法,从不能中找到可能。三是要有真抓实干的良好作风。推行“一线工作法”,干部在一线工作,决策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成效在一线检验;落实“长”字带头,要有一种从我做起,向我看齐的领导风范,以作为求地位,以绩效赢口碑。

强化“追责”意识。责任制是抓落实的有效手段,但是如果没有责任追究制,责任制就形同虚设。要确保责任制落实,必须健全完善责任追究制,实现有效追责。一是落实问责主体。要加强党内问责,同时要加大人大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体问责,提升问责的民

主参与度和问责行为的公开度,最终实现问责效应的最大化。二是界定问责范围。在注重有错问责的同时,更要注重无为问责,对那些所犯错误不大、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又够不上纪律处分的,通过问责及时整改纠正,把问责制真正全面的贯穿于决策执行全过程,贯穿于纪律作风各方面,促进问责工作常态化。三是公正问责追责。对损害形象、扰乱环境、错失机遇的典型案件,该处分的要及时处分,该追责的要严格追责,该免职的要就地免职,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作者系通城县委副书记、县长)



常思做人之准 常记为政之则

■金大德

核心观点:
党员干部应该经常想一想,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下什么。只要我们能清楚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始终保持警醒。

当前,我们的党员干部面临着各种诱惑和挑战。如何做人,如何为政,如何使用权是对我们党员干部最具体的具体考验。笔者认为应在做好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同时,还要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

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党员干部应以高尚的品德影响人,以模范的行动带动人。有德才有威,有威群众才信得过;有德才有为,有为才能凝聚人心和力量。

在当今的新形势下,对党员来说,如何立身,为何做人,不仅是个人的修养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风气的导向和引领。党员干部以德为先,就必须记住我们来自老百姓,但不能等同于普通老百姓,必须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邓小平同志说,“领导就是服务”,道出了我们每个党员干部这个岗位的真

谛。“史者,人役也”,古代官吏尚且懂得为官是清苦之事,早起早睡,夙夜为公,不敢有须臾懈怠。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应该比封建社会的官吏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应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民谚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话虽朴实,道德却很深刻。

权力是天下公器,不是哪个个人赋予的,也不是自己生来就有的。用权不为公众服务,这样的权力迟早会被剥夺。我们应该看到,权力具有两重性,为老百姓做事,就会造福一方;为一己之私谋利,就会为害一片。

从党的十八召开后处理的贪官情

况看足可证明,贪腐不是天生的,所谓“温水煮青蛙“,一旦不能正确看待权力,不能正确处理私利,就会闻不到马屁的臭味,看不见诱饵的祸心,听不过良言的规劝。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为谁用权,如何用权,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用权不谋一己之私,对我们每个党员干部来说,是个不可逾越的红线。

总之,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应该经常想一想,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下什么。只要我们想清楚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始终保持警醒。

(作者系通山县大畈镇党委书记)

我国农民工的类型及其特征

■庞 靓

什么是农民工?
“农民工”是一个中国背景下的特有术语。
我国第一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提出“农民工”的概念,是在国务院1991年7月25日颁布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中。其中第2条规定:“企业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是指从农民中招用的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实行劳动合同制的工人,包括从农民中招用的定期轮换工(以下统称农民工)”。1999年8月30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6章第66条规定:“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抢险救灾、或者属于利用扶贫资金以工代赈、需要使用农民工等特殊情况,不适宜进行招标的项目,按照国家规定可以不进行招标。”这是第一部使用农民工这个词的法律(狭义)。农民工这个概念,已经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并成为了这一群体的正式称呼。此后,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在有关农民工问题和农民工权益保护文件中,都直接使用了“农民工”这个概念。

农民工作为一种劳动力资本,经历着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工业、从农民向市民进行转化的过程。这些过程无疑都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农民工群体类型
农民工外出务工动机的不同决定

了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方式的不同。有一部分农民工,特别是老一代的农民工外出的动机大多是由于经济因素,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往往带着很强的归属感,往往是抱着在外学手艺或技术就回乡就业创业的心态,或者家庭条件有所改善后就回乡继续务农,又或者只是单纯的在农闲的时候,外出就业。然而,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很大一部分青年农民工外出动机有了很大的变化,信息时代的发展,在农村的青年有了更多了解城市的窗口,通过这些窗口,他们越来越向往城市生活,有着较为强烈的市民化愿望,对家乡的归属感不断淡化,因此他们往往想长期留在城市安家立业,或者不断在不同的城市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

返乡发展型农民工群体。在返乡发展的农民工群体中,一部分是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在城市就业难,加之政府对返乡创业的政策鼓励与支持。另一部分是由于家庭环境等影响,外出务工的动机就是为了学习技术,为返乡发展积累创业资本。返乡发展型农民工区别于一般的农民工,但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农民的性质。

立足城市型农民工群体。立足城市的这部分农民工群体大多已经在城市就业多年,通过自身的奋斗与拼搏,在城市中已经有了相对比较稳定的职业和生活,自身也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或者接受过高等教育,不愿意在回归到农村生活,家庭经济条件已经可以维持在城市的基本生活。而且大多数农民工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对家乡归属感不强,希望可以通过奋斗,冲破户籍制度,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为自己的家人创造更好的条件。

城乡徘徊型农民工群体。这部分农民工群体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在不同的城市间寻找工作机会,工作并不稳定,有的只是在农闲的时候才外出务工,把城市看作驿站,减轻家庭负担。虽然常年外出,但又“移而不迁”,经常在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频繁流动。

如果按照脑力和体力标准来分,可分为脑力工作和体力工作。按是否担任领导职务为标准来分,可分为领导工作和非领导工作。按是否以财产或者主要涉及财产作为工作内容为标准来分,可分为直接以财产作为内容或对象的工作和不直接以财产为工作内容或

对象的工作。

劳工型农民工群体。这类农民工群体主要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流动性较强,他们的城市意识比较淡薄,身份认同转变程度不高。

技术型农民工群体。这部分农民工群体有一部分在就业之前接受过职业技术教育,还有一部分在进入城市务工后接受了专业技术培训,这类农民工群体掌握了一定的专业技术能力,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比普通的农民工处于有利地位。

管理型农民工群体。从事管理类的这部分农民工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在生活方式上已经趋同于城市人,但由于目前的制度因素,还不能真正定居在城市,还有一部分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也大多已经在城市就业多年,通过自身的奋斗与拼搏,走上了管理岗位,过上了相对稳定的职业和生活,自身也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

自主创业型农民工群体。这部分农民工群体渴望通过自主创业的方式改变命运,进入城乡成功人士行列。能够为自己和家人打造更好的未来,这部分人都有很强的市场意识,也积累了一

定的社会经验和财富。

农民工群体特征

返乡发展型农民工群体。返乡发展型农民工区别于一般的农民工,但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农民的性质,他们大致表现出以下特征:(1)以青壮年劳动力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为主。(2)收入处于中等水平者居多,且外出务工时间较长。返乡创业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创业原始资本的积累,掌握了一定的劳动技能和创业知识。在返乡创业型农民工中,一部分人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金、通过多年的打工经历,有意识的掌握了一种或几种技术,学习了一些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走共同富裕之路并实现自我价值回归故里,返乡创业;一部分人是由于个人或家庭原因所致,诸如子女上学、养老送终或健康原因,不得不放下来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重返家乡。(3)受城市文化与生活影响,注重生活品质,市场竞争意识强。这部分农民工由于收入,文化水平都相对较高,容易受新事物的影响,懂得享受生活,渴望被城市人接纳,却又常常表现出自卑。从生活方式看,返乡发展型农民工长期受城市文化与生活的影响,追求时尚,注重品牌,属于农村中时髦的一族。
立足城市型农民工群体。立足城市型农民工群体希望可以通过奋斗,冲破户籍制度,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他们大致表现出以下特征:(1)文化程度分布较均匀,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2)收入水平相比较,有立足城市的实力。(3)对生活质量有一定要求,渴望得到城市的认可。立志立足城市的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务工多年,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并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且经济实力足以承担家庭在城市生活中的开支;还有一部分是由于接受过高等教育,不愿再回归农村,立志通过自己的奋斗变成“城里人”的年青农民工。
城乡徘徊型农民工群体。城乡徘徊型农民工群体希望留在城市,但面临诸多困难,如果家乡有好的发展机会,也会回乡创业。其特征表现为:(1)文化程度不高,年龄在30岁以上占多数。(2)收入水平较低,职业技能水平较低。(3)工作地点流动性大,收入不稳定,工作和生活环境较差,生活质量不高。
劳工型农民工群体。劳工型农民工群体主要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流动性较强,缺乏一种对城市生活的安全感。他们的特征表现为:(1)年龄分布较广,总体文化程度较低。(3)工作地点流动性大,收入不稳定,工作和生活环境较差,生活质量不高。
(作者单位:武汉东湖学院管理学院)



如何治理“中国式过马路”

新闻事件:在路口凑够一拨人就走,与红绿灯无关。这种行人无视交通法规过路口的现象被称为“中国式过马路”。即日起,北京交管部门将依法严管此类违法行为,“带头”闯红灯的行人将面临罚款。(据《新京报》)



改变中国式道路管理

○左崇年

“凑够一拨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的“中国式过马路”,从去年开始就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人们调侃“中国式过马路”是中国人素质太差。这固然与中国公众的整体素质有一定关系,是“群体规则无意识”所产生的“蝴蝶效应”。但是,与“中国式道路管理”的弊端也有着必然联系。

中国城市普遍采纳了美国式的道路模式,没有适合中国国情的合理设置,因而在中国人口和资源高度集中的城区,这样的道路系统使得人与车的冲突更加激烈,既使堵车成为一种“城市习惯”,又使“闯红灯”的矛盾更加凸显。尤其是中国道路“开膛破肚”

成家常便饭,到处添乱;不明原因的“封路”习惯成自然;特权车横冲直撞,路权被占领;“神仙难过的红绿灯”设置极限,让人“头晕”;“撞了白撞”的法律规定,更是令人望而生畏;道路管理注重“车性化”忽略人性化,为人们的正常走路设置了诸多障碍。这些“中国式道路管理”便催生了“中国式过马路”。

找准病根才能对症下药。解决“中国式过马路”问题,首先得学习“大禹治水”的办法,重在疏导,处理好堵和疏的辩证关系。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式道路管理”的种种弊端,“中国式过马路”问题不可能终结。

立法治理行人闯红灯

○张西流

近年来,行人闯红灯引发的交通事故呈上升趋势,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因此,北京等地对行人闯红灯行为实施处罚。但问题是,仅对这种行为进行警告或采取10元以下的经济处罚,难以起到警示作用。

禁止行人闯红灯,是为了制止行人交通违法,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笔者以为,禁止行人闯红灯,应该写进“道路交通安全法”。

在现行司法实践中,先后将醉驾、驾车故意在交通拥挤路段“碰瓷”等行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对于行人闯红灯等行为,只规定了民事责任,没有规定对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

闯红灯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应该说,行人在闯红灯之前,是能够预见可能出现重大交通事故的。因此闯红灯属于明知故犯,其行为危害了不特定人群的生命财产安全,符合刑法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

对于行人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即便是没有引发交通事故,也要对其实施治安处罚,情节轻微者,给予经济处罚,情节较重者,实施治安拘留;对于行人闯红灯被车撞了,无论后果如何,均由行人承担全部责任;对于行人闯红灯,引发撞死撞伤他人的重大交通事故,应当追究行人的刑事责任,以提高行人闯红灯的违法成本。